

世界城市规划思想与实践史丛书 | 曹康主编

# 规划理论传统的国际化释读

The Planning Theory Tradition: An International Account

(英) 琼·希利尔 帕齐·希利 著

曹康 刘昭 孙飞扬 潘教正 译

曹康 校审



Jane Jacobs   John Friedmann   Judith Innes   John Forester   Susan Fainstein   Andrea Faludi   Oren Yiftachel   Vanessa Watson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世界城市规划思想与实践史丛书 | 曹康主编

# 规划理论传统的国际化释读

The Planning Theory Tradition: An International Account

(英)琼·希利尔 帕齐·希利 著  
曹康 刘昭 孙飞扬 潘教正 译  
曹康 校审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南京·2017

## 内容提要

本书详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规划理论的发展,在内容组织上创新地采用了历时性框架和主题框架相结合的编排方式。理论的发展过程被分为互有重叠的三个时期(即三个部分),每个时期又各自分为三个并行的主题(即三个核心章)。作者以其扎实的研究功底,全面梳理了浩瀚的国际规划理论文献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成果,体现了作者对规划理论演进的理解——如何对发展进行“断代”、每个阶段的主流思想是什么、对这些思想有哪些批判、对当时的未来趋势如何把握。本书是较为客观、视角较为国际化的理论总结,集中反映了作者对规划理论发展事业的释读。

本书可供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人员研究,亦可供城市地理人员及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规划理论传统的国际化释读/(英)琼·希利尔(Jean Hillier),  
(英)帕齐·希利(Patsy Healey)著;曹康等译. — 南京:东南大学  
出版社,2017.10

(世界城市规划思想与实践史丛书/曹康主编)

ISBN 978-7-5641-7376-0

I. ①规… II. ①琼… ②帕… ③曹… III. ①城市规  
划—城市史—研究—世界 IV. ①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4861 号

Adapted and transla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from Critical Essays in Plan-  
ning Theory eds. Jean Hillier  
and Patsy Healey (Farnham:  
Ashgate, 2008), as follows:  
Volume 1, pp. ix - xxvii;  
pp. 3-7; pp. 169-174; pp.  
299-305; Volume 2, pp. ix -  
xiv; pp. 3-10; pp. 205-213;  
pp. 355-363; Volume 3, pp.  
xi - xiv; pp. 3-10; pp. 237-  
243; pp. 405 - 412. Copy-  
right © 2008.

书 名: 规划理论传统的国际化释读

著 者: (英)琼·希利尔 帕齐·希利  
责任编辑: 孙惠玉 徐步政

译者: 曹康 刘昭 孙飞扬 潘教正  
邮箱: 894456253@qq.com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210096)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出 版 人: 江建中

印 刷: 南京新世纪联盟印务有限公司

排版: 南京布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1.5 字数: 158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7376-0

定价: 49.00 元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 025-83790519 83791830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或传真:025-83791830)

# 前言

(英)琼·希利尔 帕齐·希利

我们为中国读者编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描绘规划理论世界的广大疆域和丰富多彩,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精选出重要且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来回顾这个世界中所发生的重要思辨。本书在材料组织方面大体遵循时间逻辑,并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又包含了导言以及三条理论探讨线索。最后一部分主要关注近期,旨在使读者对当前给予规划以启发的思想有所了解,而也正是这些思想让人们明了那些探讨规划的本质、目的和惯例的想法日后会如何发展。在“导言:规划理论发展概览”中我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对理论的发展做了回顾,这不是一份各种理论发展的回顾,而是对那些不断在整个理论探讨中重复出现的议题的回顾。在本书中,身为作者的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弱化我们本人的理论立场。相反,我们的目的是将我们称之为“规划理论对话”这一事物不同发展时期的立场和思辨展现给读者。

本书是对我们编纂的《规划理论中的批判文集》(三卷)[2008年由英国阿什盖特(Ashgate)出版社出版]之内容的回顾和总览。这三卷共计1600页,是英文版。当然,我们无法将其以中文形式完全出版,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太“厚”,另一方面是因为版权问题。在本书中,我们只能对规划思想的发展演变做一个扼要的介绍和导引。我们将《规划理论中的批判文集》(三卷)中每一卷的导言(含各卷总导言与各章导言)放入本书中,并加入了对我们认为是每一卷最重要文献的回顾与总结。

我们希望这些回顾能让读者对多年以来加入“规划理论对话”的各种声音有一个了解,并鼓励读者进一步阅读我们回顾过的那些文献。我们承认所回顾的这些思想基本上全部来自西方世界,当然我们在每一部分的导言当中也尽力使这些思想与中国的情况、中国的读者相联系。我们十分赞赏中国的哲学传统,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且与西—北半球的那些体系极为不同,因而中国也有自己的规划思想传统。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在各种国际规划思想流派之间引发富有成

效的探讨和思辨。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非常感谢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徐步政和孙惠玉编辑,在他们的帮助下本书才得以在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们也要感谢刘昭、孙飞扬和潘教正为本书做的原始翻译工作。我们更要感谢曹康,是她帮助我们联系本书在东南大学出版社进行出版的各项事宜,并负责了本书的部分翻译和全书的校勘工作。出于中西语境的差异和部分词汇的独特性,对于曹康来说,这是一份艰巨的工作。此外,我们还要感谢之前在阿什盖特出版社工作的瓦珥·罗斯所给予我们的关于本书原版版权方面的帮助。

我们感谢为本书原版《规划理论中的批判文集》在选择文献和撰写各部分导言中提出了建议和评论的人,他们的帮助极大地提高了我们文献选取和导言撰写的质量,当然,各种疏漏与不足之处都由我们负责。给予我们建议的人包括:希瑟·坎贝尔、安琪莉可·钱德帕拉姆、迈克尔·贡德、查尔斯·霍克、贝丝·摩尔·米尔罗伊、尼拉杰·维尔马和瓦妮莎·沃森。此外,有些人对个别章节提出了非常有帮助的意见,我们将在各章节中单独向这些人致谢。我们还要向伯尼·威廉姆森致谢,他帮助我们整理了《规划理论中的批判文集》的最终材料。

# 目录

## 前言

### 第一部分 规划事业的基础

|       |                 |      |
|-------|-----------------|------|
| 第 1 章 | 导言:规划理论发展概览     | /002 |
| 第 2 章 | 规划理论:一项社会科学“工程” | /028 |
| 第 3 章 | 激发灵感的先驱们        | /036 |
| 第 4 章 | 规划:理性的科学管理      | /046 |

### 第二部分 政治经济学、多样性和实用主义

|       |                   |      |
|-------|-------------------|------|
| 第 5 章 | 导言:政治经济学、多样性和实用主义 | /060 |
| 第 6 章 | 批判政治经济学           | /069 |
| 第 7 章 | 转向多样性             | /082 |
| 第 8 章 | 规划领域实用主义哲学的复兴     | /099 |

### 第三部分 规划理论的当代运动

|       |             |      |
|-------|-------------|------|
| 第 9 章 | 导言:规划理论当代动态 | /114 |
|-------|-------------|------|

|        |                     |      |
|--------|---------------------|------|
| 第 10 章 | 沟通实践与意义的协商          | /121 |
| 第 11 章 | 网络、制度与关系            | /137 |
| 第 12 章 | 复杂性“转向”:希望、批判与后结构主义 | /148 |
|        |                     |      |
| 附录:    | 人名对照表               | /161 |
| 译者书评   |                     | /167 |
| 译后记    |                     | /177 |

## 第一部分 规划事业的基础

第1章 导言:规划理论发展概览

第2章 规划理论:一项社会科学“工程”

第3章 激发灵感的先驱们

第4章 规划:理性的科学管理

# 第1章 导言：规划理论发展概览

强大的理论将我们重新导向那些本来可能会被忽略的，或者那些已在思想意识或方法上被转移注意力的问题和议题上。

——约翰·弗雷斯特(Forrester, 1993)<sup>1-2</sup>

规划业界人士或与规划打交道的人一如既往地谈论着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的挑战，或者提一些与影响规划思想和规则发展的概念相关的问题。然而，尽管有学者对规划思辨近年来发展进行了有影响的综述，但仍然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读到那些综述所引用的文献，或是将那些文献与规划思想的发展联系起来。规划思辨在各种规划专业中的模式都不相同。并不是所有的专业都包括必需的规划理论模块，也不是所有对规划领域感兴趣的人都在规划专业下学习过。因此，就算是那些受过正规规划教育的人，也并不一定就知道规划理论内部的思辨。本章呈现的是作者本人对理论发展的概览，但并非对不同发展线索的回顾，而是概述那些不断在规划领域里重复出现的议题。

## • 作为一种思想领域的规划理论

“规划理论”这个领域的核心，是对思想和概念感兴趣的人之间的辩论和“对话”(Rorty, 1980)，这些思想和概念能够且(或)应当影响规划实践活动。该领域作为一个受到认可的学术焦点出现于20世纪中期，这是就当时出现的一些相互引用的文章的意义而言(Friedmann, 1987; Reade, 1987)。在此之前，规划“理论”是作为一种认为社会和城市应该且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提议而存在的，而且它是作为政治纲领或职业实践的一部分而得

到发展,并没有通过充分论证的学术思辨。有些人声称规划实践的不断失败是源于缺乏足够的理论化(Reade,1987)。其他人则将“规划理论”理解为一种通用的实践模型或是一套如何实施规划的规则,或者是某种线性过程——规划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先是被学者明确,然后再被用于实践。然而,人们如何设想并思辨规划思想与这些思想的各种实践形式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复杂且相互影响的。对规划的本质、目的和实践进行思辨是规划理论领域的核心,它更像一种基于哲学的活动,其中加入了有关社会、城市、区域与场所本质的一些概念,以及政府为了塑造未来应当做些什么、如何去做的一些设想。

在这些思辨中,使该领域关注点变得明确的两个研究方向一直处于辩证的张力之下。其中一个方向考虑的是理论的实质内容,另一个方向则关注规划如何成为一种过程。这个“实质”方向研究的内容很多,包括社会组织,城市、区域和场所的发展,社会和城市某些特殊品质的提升,有时三者全都研究。而“过程”方向下也有各种研究内容,从专门的职前技术管理到更为宽泛的对智力与协商研究团体的促进都有。规划领域在进行批判性思辨时,时不时会声称这个方向比那个更重要,或者一种研究关注点比另一种更关键。但是这种偏激的思辨通常会导致讨论退回到一些论证上去,如内容与过程的相互作用、场所动态及其品质与管治动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等。

另外一个方向同样会引发领域内热烈而持续的讨论。对于许多人而言,规划是一项改善社会和城市状况的实践事业。在这种观点下,规划理论与实践完全是关于社会和城市应当怎样的规范议程。但是其他人却批评这种社会承诺,因为它是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后果。持这些批评观的人转而认为,需要将更多的关注放在社会与城市发展的动态背景上来,找出规划活动在这些动态中的合适位置,并预测这些活动有可能产生的效果。这些规范性承诺和规划理论思辨的分析性重点之间的关系再一次变得复杂,许多参与者都看出了两者的重要性。

有好几位学者绘制了规划理论领域演化的年表。学者们关于上述方向所持有的立场构建了这些年表本身。因为在 19 世纪的工业化之下全球进行着大规模城市化,城市与区域物质规划思想的发展也异常活跃。20 世纪上半叶,出现了有关规划社会和恰当的管治过程的思想,这是由于为复杂城市化社会而进行的管治活动,其复杂性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些年表本身也说明了在涉及上述研究方向时,年表的作者们怎样对自身进行定位。在第 2 章我们回顾了 20 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规划理论领域的重要“地图”。在第 3 章,我们回顾了 20 世纪早期所形成的重要思想。

最初,与其他知识“学科”一样,那些提倡或从事某项活动的规划者们汲取着各种灵感之源——从乌托邦到对具体情况的分析、从意识形态到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实践都有。然而到了 20 世纪中叶,好几支理论思辨的脉络开始相互交织,并在思想网络中形成了各种“节点”,如某些大学的院系或通过学术会议编纂的会议论文集和学术期刊。20 世纪 40 年代,芝加哥大学是一个关键节点,在那里,利用了美国“新政”下社会和区域发展计划的社会管理思想与“管理科学”的设想及其在公共与私人管理方面的应用发生了碰撞(Friedmann, 1973)(参见第 4 章)。这些思想受到了凯恩斯式设想的强烈影响,后者与欧洲发展“福利国家”的战略类似,认为国家的职责是为民主社会下发展混合的资本主义经济创造条件。在这个设想中,规划被视为一种国家、区域和城市的关键机制,一种表达未来发展轨迹的机制。后来,这种方法被地理学家大卫·哈维(Harvey, 1989)定性为“管理主义”。

不过,这个关注点的发展几乎与另外两支有关规划本质与作用的思辨脉络无关,有时还与它们相左。这两支中的一支与芝加哥学派的观点类似,但其根源主要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和分析。它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认为该社会的根基是资本主义企业对劳工阶级的剥削关系。这一设想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人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欧洲不人道的工业生产状况的有力分析发展起来的。这支脉络的政治力

量来自于不断重复的经济萧条使人们的生活愈加艰难和岌岌可危的实际情况。凯恩斯提倡管理市场以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提倡发展福利事业以防止人们因“市场失效”而遭受苦难;而社会主义议程与凯恩斯的思维不同,提倡用国有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经济。规划这个想法作为一种机制而得到发展,在这种机制下,资源在国家活动之间或其范围内得到分配,并与发展目标相关。“经过规划的社会”的合法性则来自一种假设,即“国家”“是”人民的因而会处处“为”人民,而“市场”则不会。尽管我们现在对国家的政治和实践会如何颠覆这一思想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它仍然是20世纪中叶对“混合”经济国家(将“国家”与“市场”进程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实际发展方式(参见第6章)持批评态度的那些作者们的重要思想源之一。

另外一支脉络其核心是“建造城市”的实践,是城市物质实体的发展。这一支脉络的节点位于建筑师、工程师和测量员的网络上,他们在国际化的基础上彼此交换想法、技术和经验。20世纪早期各大帝国所提供的机会是这种交换得以进行的原因之一,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工业化导致了快速城市化,也带来了已被专业人士和活动家察觉出来的特殊挑战。在这些思辨中逐渐出现了关于干净的、健康的、美观的宜居城市的思想,用以对抗“梦魇般的城市”(Hall,1988)——污染、贫穷和无法控制的政治机构——就像不少著作中描写的那种涌现而出的城市综合体。城市建造者的职业网络不断发展壮大,掀起了规划版的“现代”运动,并且发表了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宣言(《雅典宪章》)(Gold,1997)<sup>①</sup>。但总会有挑战这些思辨的备选方案,它们关注的是人们实际上如何生活、如何迁居,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无政府主义对小尺度自控社区的探索到新城管理的具体思路(Hall,1988;Ward,1994;2002)。“国家”和“市场”的相对价值这类问题在这些理论思辨中则不是那么重要,它们通常以决定论式的方式来关注实体环境与人们如何以及怎样生活之间的关系。

有关社会发展形态及其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思辨古已有

① CIAM,即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rchitecture Moderne,创建于1928年,是在建筑和规划领域倡导现代运动的一支主要力量。

之。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对古代希腊与罗马“经典”文化的全面复兴,使得20世纪早期规划思想的倡议者能够在历史当中寻找灵感<sup>②</sup>。但是20世纪规划思想的发展与历史有所不同,一是因为科学、技术和工业创新的规模如此之大,不仅改变了经济运行,也改变了城市发展的方式;二是因为这种发展造成了人口和财富在数量上的飙升和在空间上的大规模迁移;三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稳步地发生从农村到城市社会的转变<sup>③</sup>。在快速变化的条件下,20世纪上半叶人们一直在谋求施加秩序以及稳定的力量,无论是社会发展的还是城市发展的规划思想都与这样的20世纪密切相关。

因而,与规划实践一样,规划思想与概念的思辨并不是一群敬业的学者闭门造车造出来的,虽然有时候似乎是这样。相反,“规划理论”的研讨是置身于主流思想的大潮中进行的,并与生活经验、政治事业和特定习惯相联系。规划思想和概念的这种“置身性”其本身就是规划理论家思辨的一个重要议题,近年来更是如此。规划师一旦考虑到“外部”世界的乱流,并向政治领袖建议如何更好地迈步向前以创造未来,则他们更像是处于未来会从中显现的那些流程之中(参见下文,及第三部分中的章节)。此外,规划思想和经验的日益国际化,也使得大家更为敏锐地发现背景文脉的特殊性会影响解读的方式——解读规划、解读它如何实践、解读它过去和未来的作用。

规划理论思辨的“置身性”意识,是在其他思想领域的探索中受其影响而产生的。撰写规划思辨文稿的作者们已经在从经济学、政治科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和人文学科,以及建筑学、工程学、运筹学和系统科学等领域的思想中汲取灵感。其结果是,规划理论领域虽然自身仍然具有“学科对话”的性质,但它在灵感、指涉以及论证方式方面是多学科的。比这种多学科性更甚者,是规划理论领域已经向20世纪中叶以来横扫社会科学的思潮和政治运动敞开大门,这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系统思想、20世纪70年代的解构主义政治经济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及其他冠以“后”的思想、20世纪90

② 在希腊“城邦”中,关于城市、社会和政治的思想被统合到一个综合概念中,至少是对于自由的男性而言!这一点反映在英语的词语族中,即政体、政治、政策和“城邦”。

③ 据报道,2007年50%的世界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地域当中。

年代的“文化转向”和后结构主义,以及2000年后对“复杂性”的兴趣。规划理论领域的这种敞开性在“解读”规划理论文献方面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因为作者们很少腾出笔墨去充分解释他们的思想和词汇是如何从这些“思潮”中得来的,而且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时滞效应,即一群作者的基本思想被后来另外一群作者重新发现,并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色彩。语汇极少有固定的含义,而且仍然需要继续放置在作者进行创作的“思想世界”当中。但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孔隙”、太开放,这样致使规划理论变得有容乃大,能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对规划的多元维度保持敏感。

孔隙性和包容性在当前来讲格外重要,因为规划概念和思辨正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这使得诸如城市与社会如何发展、好的管治由什么构成等理念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思想传统下落地时,其接受度有多大变得更加重要。虽然自19世纪起,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实践经验(主要与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的实践活动有关)被纳入到规划思想和规划理论当中(Al-Sayyad, 1992; Driver, 1992; Gunder, 1967; Legg, 2007; Perera, 2002a; 2005; Rabinow, 1989; Healey and Upton, 2010),但从起源和构成上来说,这些经验主要还是西方的(Ward, 2002; Sanyal et al, 2012)。西方世界在政治与政府上存在父权式、中产阶级式的传统,在此传统中对社会的管理被视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的特权(Perera, 2002b)。近年来,西方民主已经致力于克服自身传统的局限性,这反倒凸显了规划思想中的一些偏见。这种偏见通过让妇女、底层阶级、被边缘化的种族和少数民族群体难以在公共事务和学术研究中发声,使得很多对规划思想的潜在贡献变得无法看到。

这些转变,反映出许多西方国家对公共政策和规划理论思辨的关注度在过去20年中得到了加强,它们将那些被边缘化的声音从背景拉到前台来。反过来,20世纪中叶时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概念——多元化利益集团的社会——已经发展为有关多元性与多样性的更为复杂的概念。大家已经更能接受以多种方式

观察和理解世界,这是一种文化多元主义,它提供了识别紧张和冲突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某一政体当中各个群体在分配资源和机遇上的冲突,更是关于场所性质和政体的种种观念之间的冲突。这样就抛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什么会被视为有效的“知识”、规划活动合法性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这不仅对当前政治科学和公共政策领域的讨论产生了巨大影响(Benhabib, 1992; Connolly, 2005; Young, 1990),也对规划领域影响甚大,它格外关注日常生活的共享空间中多元共存现象涉及哪些内容(Healey, 2006[1997]; Hillier, 2006; Sandercock, 2003)。因此,政治学当中的“大主题”——谁拥有对谁的权利、权利和义务如何分配、政府如何确立合法地位、谁的“声音”算数——需要在城市场所管理的实践中、在战略制定过程中、在规划领域当中被重新审视。

#### • 规划理论与“规划思想”

规划理论思辨的跨度极大,从对城市住宅小区的微观式管理,到人像什么这种哲学问题(我们的主观性和身份)、什么样的以及谁的论证更“合法”以及我们如何在集体/政体中生活(我们和“他人”的联系、我们如何识别“他人”)都有。在规划思想的发展中,把这些问题组织到一起的是一个承诺,即要集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那些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声称要将规划视为一种“活动”,他们被要求对这项活动的本质是什么且应当是什么进行明确和证明。发展活动本质思想的人被要求考虑“规划活动的实施”这种观点所造成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下文当中予以讨论,它是规划理论思辨其中的一个主要议题。

建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相互联系的承诺一直在受到挑战,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理论”研究者和“从业者”之间的鸿沟通常大到无法弥合,在部分理论学者转向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来的更为抽象的问题时这种倾向更明显,且双方都被指责说是对对方的关注太少。其二,“规划活动”由什么构成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含糊,其焦点也不停地在变化。它是社会发展的规划,

还是任何公共政策计划的发展和形成,抑或是对场所、城市和区域的规划?无论其焦点是什么,规划“思想”要做出的贡献是什么?这是否在于政府采纳的方法——一般意义而言的好的管治,或更具体一点,开放的、透明的、政策驱动的政府的流程理念?或者,考虑到社会公平或社会凝聚、环境品质和可持续性、经济活力和“竞争性”的话,在于其推动的社会价值<sup>④</sup>?还是说,规划思想的核心在于这些价值观如何整合起来?在这些价值观本身都被边缘化的地方推动规划思想,会发生什么?那时,“作为一种行动的规划”如何和应该怎样进行?规划行业是否有特定的“工具和技术”能够引领规划思想向前发展,去挑战对规划思想的价值观漠不关心的实践,而不管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一项“规划”是这样的工具吗——评价和评估技术是吗?还是说,规划的核心在于对特定过程的应用,无论这个过程是一套理性决策步骤还是某种交互的协作过程?开发这些工具、技术和过程的合法性又从哪里来?

这些截然不同的问题正是规划理论领域经久不息的思辨的对象,也是本部分各章节所要描绘的对象。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结论如何得出,这与提出者的学科背景有关,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词汇和参照理论。但原本要散开的理论又经由“对场所的管治”这一考量而重新凝聚起来,或者如弗里德曼(Friedmann, 1987)所说,是对社会(无论是小的社区还是大的国家级和跨国级政体)发展的引领将它们凝聚起来。因而,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人类状况与存在着人类与非人关系与力量的广阔世界进行的“改良”(无论怎样理解这种改良),促使要进行实践的规划思想尝试着去管理社会发展。

置身于21世纪,规划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所给出的规划思想发展史通常会强调理解上的主要转变。在认识到管治过程和转型举措的复杂局面之后,以综合的方式在国家所有层面对社会发展都进行规划的雄心,也让位于仅仅想要对正在出现的城市与区域动态以及场所品质进行塑造的愿望。曾经有这样的观念,即“规划师”是某种值得信赖的技术专家且与大众有很大不

④ 2000年后,许多对规划实践的分析都把重点放在主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其他政治讨论之间的斗争上,前者强调提升“经济竞争力”,后者更关注于社会公平和/或环境可持续性。

同,能够周密地制订方案和规划,并将不加约束的不公正的市场过程下的一团乱麻变得“有序化”。现在这样的观点第一次让位于另一种看法,即规划还不如说是“引导的手”或某种具有矫正作用的“调控”机制。后来,这种观念又让位于新的设想,有关如何识别、“塑造”并管理非线性的、无法预期的且正在出现的过程。“规划实践”——作为行动的规划——已经从一种经由正式建构的行政结构和具有合法权威、可强制执行的规划和标准推动的政府活动,转变为由各种相互影响的群体进行的活跃实践:规划师不断面对复杂的价值输送判断,这包括听取谁的话、运用什么样的知识、充任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在具体情况下扮演角色,等等。我们将这些转变写入本书,并揭示出它们如何与广泛的思想与政治思辨相联系。

现在,我们通过更为细致地了解某些反复出现的相互交叠的主题(也是本书涵盖的主题),来撰写所有章节都将涉及的思辨和问题的导言。某些思辨已经介绍过,大部分思辨与更广泛的理论思辨相关,但已经以某种特定形式在规划领域内得到发展。不过,这些思辨可以洞察推进规划思想的含义、作为行动的规划的含义、作为“一名规划师”和进行“规划工作”所包含的复杂的伦理和实施困境的含义。

## • 反复出现的主题

### (1) 理论与实践

规划领域对人类知识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它一直在处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某种层面来说,这种相互关系非常特殊。进行设计和调控重大开发项目的从业者为了声明做那样的设计或规划那种综合设施是为了“公益”,或者是为了“公众利益”需要开发商的各种支持,他们可能会寻求一些原理来支持他们的做法。他们的声明行为衍生出一些关于“公众”“公益”“利益”以及这些是对谁而言的问题。这导致规划理论加入到法律和哲学的思辨当中。规划理论学者可能还会加入到其他批判性思辨中,譬如为何开发项目实践那样进行,并导致了那样的声